



家庭与夫妻治疗： 案例与分析

[美] Salvador Minuchin Mich P. Nichols Wai-Yung Lee 著
胡赤怡 卢建平 陈 珏 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Assessing Family
and Couples:
from Symptom
to System



家庭与夫妻治疗：案例与分析

Assessing Families and Couples: From Symptom to System

[美] Salvador Minuchin

Michael P. Nichols

Wai-Yung Lee 著

胡赤怡 卢建平 陈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庭与夫妻治疗: 案例与分析 [美] Salvador Minuchin, Michael P. Nichols, Wai-Yung Lee 著; 胡赤怡, 卢建平, 陈珏译.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12

(社会工作流派译库)

ISBN 978-7-5628-3674-2

I. ①家… II. ①Salvador… ②Michael ③Wai-Yung… ④胡…
⑤卢… ⑥陈… III. ①家庭关系 IV. 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4200 号

Copyright © 2007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独家拥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3-613 号

社会工作流派译库

家庭与夫妻治疗: 案例与分析

Assessing Families and Couples: From Symptom to System

著 者: [美] Salvador Minuchin, Michael P. Nichols, Wai-Yung Lee

译 者: 胡赤怡, 卢建平, 陈珏

项目负责: 刘一军

责任编辑: 高虹

整体设计: 袁银昌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 话: (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3797(编辑室)

网 址: press.ecust.edu.cn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9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28-3674-2

定 价: 59.00 元

联系我们: 电子邮箱 press@ecust.edu.cn

官方微博 e.weibo.com/ecustpress

淘宝官网 <http://shop61951206.taobao.com>



译库学术顾问委员会

译库顾问

钱旭红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院士、教授

柳拯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译库学术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Ira Cobly 美国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Jack Richman 美国北卡大学(UNC at Chapel Hill)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John Carpenter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社会工作教授

Lena Dominelli 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社会工作教授

Patrick O'Leary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阮曾媛琪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前主席、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何雪松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系教授

宋林飞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教授

陈丽云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主任、教授

范斌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教授

徐永祥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永祥

执行主编 何雪松

委 员 范斌 张昱 朱眉华 费梅苹 曾守锺 赵环 王瑞鸿

这是我们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第二套译著丛书。本世纪初，我们所推出的 18 种一套上海市重点图书“社会工作名著译丛”获得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本套译库与以往不同的是，更加聚焦于介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流派，但又不局限于理论流派的译介。西方的社会工作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诸多视角、理论、模式与方法。知识转移与全球共享是当代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熟知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对于建构兼具国际规范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制度、实务模式，无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唯其如此，中国社会工作学界才有可能参与全球专业知识库的建构，以推动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制度设计与发展经验具有本土的特点，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框架去加以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警惕本国专业共同体因理论的“不自觉”“不自信”而在全球知识界处于失语状态。因此，必须立足和扎根于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新社会组织、新社会服务和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的实践，积极进行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创新。唯其如此，中国的社会工作学界才有能力提升在全球的话语权，从而为全球社会工作贡献中国的力量。

衷心希望本套译库能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支持，以进一步推动国内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与知识建构。须知，没有系统强劲的社会工作理论的科学支撑，就不可能有系统强劲的社会工作发展实践。

本套译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为此我的感谢与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这里，我还要向所有参与翻译本套译库的同仁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的奉献体现了社工学人的专业精神！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因为他们始终对我们充分信任及对社会工作学科建设鼎力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何雪松教授，因为他持之以恒的追求、坚持和奉献，我们才有了本套译库的中文版！

是为序。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徐永祥

前 言

任何一部由两位或多位作者合写的著作，都一定有它如何面世的故事。对于本书来说，有三个这样的故事。我们希望这三个故事，可以成功地融入后面的章节。Salvador Minuchin，从事临床工作多年，希望能写一部总结性的著作，并且希望这本书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它以一种雅致的方式，囊括了他临床经验的精华，既饱含知识，又充满美感。Michael P. Nichols，对年轻学子施教多年，希望能为刚刚开始临床之旅、既充满憧憬又颇感迷茫的青年学人写一些有益的东西。李维榕(Wai-Yung Lee)，其治疗实践深受其自身的中国文化根源的影响，希望能对不确定的箴言畅抒己见。

当然，作者们的合作，是一个趣味盎然且错综复杂的过程。引论是三位作者的共同产品；案例虽然由第一作者撰写，而且可以说是治疗师的产物，但所有作者都参与了评述。五组案例前的介绍由 Michael P. Nichols 撰写，李维榕则撰写了结语。

而对 Sacramento (萨克拉曼多，美国加州首府) 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的 Chrystal Barranti 以及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的 Kathleen Briggs 富有真知灼见的述评，作者们在此表示感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引论：家庭与夫妻治疗的四步模式	1
第一部分 麻烦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	23
第二章 父母化了的孩子	31
第三章 冲突的夫妻/三角化的孩子	55
第二部分 有继子女的家庭	79
第四章 撒谎的少年	87
第五章 三个二人组合并非一个完整的家庭	109
第三部分 互补的夫妻	135
第六章 一位激越性抑郁的成年女性	143
第七章 手总是很脏的妇女	169
第四部分 心身家庭	185
第八章 患有胃绞痛的俄狄浦斯	193
第九章 罹患神经性厌食症的中国男青年 ——相同的地图,不同的治疗师	215
第五部分 家庭和社会服务	243
第十章 三代妇女	251
第十一章 毒品成瘾及其家庭的居住式治疗	277
结语	303
后记	309
内容提要	317

第一章

引论：家庭与夫妻治疗的四步模式

家庭治疗演变的简短回顾

家庭治疗的先驱者告诫我们，要以超出个体特征的眼光，去审视使家庭成员之所以构成一个家庭的模式；家庭是由彼此联系的生命构成的，并且它又是由严格但未言明的规则掌控的。

不过，自 Bateson、Bowen 和 Ackerman 时代以来，这个领域已经有所改变，从最初强调家庭的互动(family interactions)，逐步发展到专注于对经验的叙说性建构(narrative construction)——简而言之，就是从人际关系的视角转变为个体认知的视角。但是，如果你认为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s theory)的最大创新，在于发现了人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并且认为家庭成员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他们互动方式的一种功能而已，那么这种改变就未免有些令人困惑。

基于这个前提的各种治疗方式，其目的均在于改变家庭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family)。我们也因此想当然地认为，一旦家庭组织发生了变化，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生活也会随之相应地改变。家庭治疗的繁荣不仅仅是因为其效果，而且还因为它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了人类状况的最基本的相互关联：家庭系统理论告诫我们，家庭远胜于个体的集合(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有组织整体，它的每个部分以超越其各自特点的方式来发挥其功能。

为了看到整体，我们学会了通过模糊(blurring)对个性的关注，从而去审视系统这个统一体。不幸的是，在回头审视系统的过程中，家庭治疗师有时会无视组成家庭的个体(相当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译者注)。如果不对人们所处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特别是家庭加以考虑，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作为个体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将关注点限制在互动的表面——即完全脱离内在经验的社会行为上，这无疑也是一种误导。

家庭治疗进入 21 世纪的桥梁是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它认为我们的经验不过是我们清楚地表达事件的方式的一种功能而已——即我们用以描述我们经验的故事。这种从行为到认知的转变，开拓了各种新的可能性。

当今家庭治疗独执牛耳的叙说方式，实乃后现代(postmodern)革命的完美表达。当所有的知识都被认为是建构而不是发现的时候，以下说法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家庭治疗的主导方式应该关注人们创造意义(create meaning)的方式，而不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幸的是，在重新发掘个体及其内在经验的过程中，后现代方式已经出现无视家庭及其内在关系的倾向。

这一领域从家庭互动转向个体认知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为了改变家庭而将注意力放在技术上，使得我们远离了对家庭的研究。受到 Bateson 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的观察和研究的激励，第一代家庭治疗师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观察和聆听。他们之所以愿意观察和了解家庭，是因为家庭当时尚属于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不幸的是，当家庭治疗师变得越来越关注治疗技巧，而不是去理解家庭的时候，他们便开始远离这种接纳性的开放(receptive openness)。于是，改变、改变的动力学、声音和意义的延伸变成了焦点；而心理组织(psychological organization)以及创造意义和对话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结，虽然没有被全然忽略，也几乎被弃之不顾。

此外，当代家庭治疗忽视家庭取向的另一个原因是，家庭治疗领域一直存在一股令人厌恶的反家庭暗流。治疗师最初是以对手的身份进入家庭的。家庭治疗的出现本应是一种科学的进步，但也不免会受道德和政治的潜在影响(undertones)。以前，疯狂(madness)是被忽略、被放逐或者被禁锢的，现在却要由家庭来承担责任，接受责难。家庭治疗师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疯狂行为赋予了意义，认为这种行为不过是对紊乱的家庭环境的一种绝望的、不得已的处理方式；由此，家庭治疗师将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精神病性的无可救药的地步拯救出来。发狂的不是病人，而是家庭。

治疗师们努力让家庭的个体成员成为其权利的自主主体，这实际上是对抗拒成长的家庭权威的挑战。个体成员可能要求改善，但是，家庭或许需要某个人来充当“病人”的角色。病人由此变成了“被认定的病人”(identified patients)——家庭的替罪羊(family scapegoat)，为维护家庭不安全的平衡而做出牺牲。家庭治疗师把他们自己看作复仇的天使，热衷于通过“谋杀”(slaying)家庭中的残暴之人(dragons)来援救无辜的受害者。攻击家庭的最尖锐的声音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根据 R. D. Laing 的说法¹，孩子一生下来就成了家庭和文化桎梏的囚徒。

Laing 曾将家庭形象地描述为反面角色——“现代社会的集中营”，虽然这样未免太过戏剧化，也太过极端，但它的确与多数人看待家庭的方式并无二致。

尽管 Bateson 团队的观察不可谓不科学，但他们用来描述家庭系统的语言却未免有点杀气腾腾，他们常常暗示家庭系统不只是无意识地抵抗改变，而且还有意识地挑战改变。“双重束缚”（double bind）的概念引导了一种治疗理念，也就是将个体从家庭病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种对家庭敌视的观念，同样也将治疗师置于敌对者的位置。因为家庭被视为愚笨无知的系统，一旦同时被视为僵化（顽固地坚持他们自己的方式）以及捉摸不定（难以把握），则对他们进行访谈便无异于一场搏斗。甚至那些不再认为病人是其恶魔般的亲属的无辜牺牲品的家庭治疗师们，也常常会觉得他们自己在反对家庭，因为这些家庭顽固抵抗各种旨在改变他们的种种努力。这种对家庭敌视的观点，可以在 Bowen “未分化的家庭自我体系”（undifferentiated family ego mass）² 的概念中一览无余，这个概念意味着要降低自我的个体性。甚至 Minuchin 旨在解救三角化的孩子（triangulated child）、针对“缠结家庭”（enmeshed families）³ 的工作，以及 Milan 学派“肮脏游戏”（dirty games）⁴ 的概念，也常常以对敌斗争的面貌出现。

当今时代，当家庭治疗师们呼吁对家庭应采取合作式方式（collaborative approach）之时，他们铭刻在心的，是要摆脱先前模式的那种显而易见的攻击性。先驱们最初进入家庭时常常将家庭视为对手（adversary）——“过稳态”（homocostatic）和“阻抗”（resistant）——部分原因是他们进入家庭时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一心想拯救“家庭的替罪羊”，所以将母亲视为要被制服的敌人，而将父亲视为可以被忽略的边缘人物。但 Harlene Anderson 和 Harry Goolishian⁵ 在提倡合作式方式之时，则正式宣称摒弃独裁者模式（authoritarian model）。这种独裁者模式认为：治疗师作为无所不知的专家，可以为病人提供其所寻求问题的答案。后现代治疗师在拒绝控制论模式——家庭犹如一个功能不良的反馈环（dysfunctional feedback loops）——的同时，也对家庭本身一定有某些错误或缺陷的观念大加挞伐。不幸的是，他们还是回归到了家庭治疗开宗明义的三个发现：（1）认为心理症状常常与家庭冲突有关；（2）认为人的问题可以相互影响；（3）治疗时应将家庭视为一个单元。

家庭治疗的早期版本，有时确实会将家庭视为洪水猛兽，并因家庭所存在的问题而对其大加责难。叙说运动帮助将治疗师与家庭的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然而，叙说治疗师在拒绝家庭治疗早期施恩于家庭的思想意识的同时，也对系统式思维予以拒绝，这样虽然强调了机械论的元素，但却忽略了其更为人性化的含义。

结构式家庭治疗演变的简短回顾

《家庭与家庭治疗》(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⁶ 这部著作在 30 年前便深受欢迎，原因是它不仅为理解两人之间相互交换的动力学 [双重束缚，追赶者—回避者 (pursuer-distancer)，等等]，也为理解整个家庭的组织，提供了简单且全面的模式。家庭治疗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家庭常常以个体集合的方式出现，而且家庭成员相互之间极具影响力，又不易于被理解。结构式 (structural) 家庭治疗虽然在其实施过程中，难免忽略个体动力学，即在建构家庭经验时拒绝个人历史的影响，并且因为偏爱过程而忽略了意义，所有这些或许是其瑕疵所在，但它的确为家庭治疗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其实施更具有条理，更具蕴含意义。不仅如此，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确一直遵循一个基本路径 (trajectory)，即从试图去理解家庭，到制订策略去改变人们。

在有关我们工作的第一部著作《贫民窟家庭》(Families of the Slums)⁷ 里，我们重点谈到了家庭组织，描述了亚系统 (subsystem)、联盟和联合 (alliances and coalitions)、区分功能的界限 (boundaries)、归属于不同亚系统的家庭成员的不同的行为方式，以及缠结或疏离组织所导致的失败的结局。治疗是基于对家庭组织的理解。治疗性探索的目标在于发掘导致某种类型的经验和行为的家庭组织——尤其是那些促使青少年付诸行动的行为 (acting-out behavior) 的家庭关系类型。因此，准确的评估是干预的先决条件。

在《心身家庭》(Psychosomatic Families)⁸ 一书里，我们讨论了何种类

型的家庭关系导致了躯体化(somatization)。只有当我们对动力学有所理解时,才有可能发展挑战病理性僵化的技术,并促使新的关系模式和功能方式的形成。再重申一次,评估才是重中之重。

在《贫民窟家庭》这部著作中,我们提出了家庭组织的一种疏离类型——父母要么对孩子的行为漠不关心,要么对孩子实行独裁主义的控制。他们的行为方式,不是忽略就是暴力。这样的父母对孩子所做出的反应,主要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基于孩子的行为。无法对父母的反应做出预测,这无疑会妨碍孩子对规则的理解,并阻碍他们形成内在的自我控制。孩子总是需要父母来控制,这样的控制也常常会变得反复无常。我不知道当今时代是否仍然可以遵循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贫民窟家庭》一书时所接受的所有假设,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在试图改变家庭之前,探索的重点应该是对问题的理解。

在《心身家庭》一书里,我们试图描述导致躯体症状的家庭组织。我们假定这些家庭缠结、回避冲突、过度保护,而且父母之间通过被认定的病人的三角化而避免了直接的冲突。此后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对我们的一些描述提出了质疑,而且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不过,我们干预的力度是基于我们对受到重重保护的家庭动力的评估以及我们的警觉性,例如,对于有厌食症孩子的家庭来说,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过度饥饿所导致的紧急情况。我们所提出的用来挑战过度饥饿模式的午餐治疗(lunch session),便是基于我们对家庭组织的理解。午餐治疗的目标在于引发父母与被认定的病人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对父母借助被认定的病人以回避夫妻之间直接冲突的方式提出了挑战。

与我们对付诸行动的儿童(acting-out children)的工作一样,对厌食症孩子的工作,也是从观察家庭功能开始,并对家庭组织做出理论假设,然后才发展技术,引导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此后,对家庭的理解受到削弱,而过于强调发展干预方法以及对治疗师风格、家庭情境和提供服务的公司组织进行探索。家庭治疗领域已经在向摒弃观察家庭的方向转变,逐步转向于技术[循环提问(circular questioning)、假设(hypothesizing)、恒定不变的处方(invariant prescription)],转向于治疗师的权威问题,以及作者的身份(authorship),后来则转向于为行为赋予意义的故事的作用。

50年后治疗师的风格

● 治疗师的风格，会随着他或她个人的成长和职业的发展而改变，并且与时俱进或因时而变。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我回首过去时，我看到的并不是毫无缝隙的轨道，而是一段伴有驿站的旅程；有时停顿下来，认识到我自己正在确定无疑地误入歧途时，我便会由此重启旅程。这是一段布满岔道、停停走走的旅途。

Mara Selvini-Palazzoli⁹，一位非凡的先锋人物，勇敢地将她的错误和新的起点公之于众。显然，每个起点都必定为开辟新的旅程提供能量。不过，令她的学生和追随者感到沮丧的是，还存在另外一个同样确定的起点。矛盾处方(paradoxes)被循环提问取代，家庭游戏也让位于恒定不变的处方，而她的同事 Boscolo 和 Cecchin¹⁰ 却又用关注对意义的建构这个后现代方法，取代了他们以前的方法。

同样地，经过五十多年的治疗师生涯，我虽然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一贯的思维方式，但也一直孜孜不倦地在历练我干预的风格。首先，我要承认，我有博采众家之长的癖好。我在阅读同行著作的同时，常常有自己个人的评价与判断，极少无动于衷。而且我复制。我曾经复制过 Virginia Satir 和 Nathan Ackerman，复制过 Bateson 和 Haley，复制过 Whitaker、Bowen、Watzlawick、Peggy Papp 和 Cloe Madanes。此外，我还复制过后现代主义者，如 Milan 学派、Harlene Anderson 和 Harry Goolishian、Michael White 和 David Epston、Steve deShazer，以及许多其他人。

我从来不会认为，任何人享有我们思想的专有权。如果某个治疗师的想法很好，它应当是他或她给这个领域的礼物，可供任何人挑选。虽然如此，我知道，当我复制 Carl Whitaker 的时候——问某个配偶，他或她是否已经与伴侣“离婚”，而且娶了或者嫁给了孩子或高尔夫——我不是在模仿 Carl；我是在对他兼容并蓄，所具有的西班牙口音和其中的微妙之处，是我的，而不是他的。

生活经历可以塑造治疗风格。Jorge Luis Borges 教会了我神秘和不确定的价值。我的母亲，教会了我在生活中秩序的重要性。我的父亲，让我知道了什

么是对正义和公平的扭曲；让我领悟了作为一个犹太人，民族的重要性；让我知晓了作为一个移民，没有归属感的忧虑。过去那些几乎被遗忘的经历，在与某一个新的家庭相遇时，便会被重新点燃。一旦你接纳了治疗师是一种有所偏爱甚至存在偏见的工具这种观念时，你就会意识到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的重要性，你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借鉴生活中的经验。这只是有关自我使用的一部分，对家庭治疗师来说，如何在治疗中运用自我是需要接受专门训练的。

当然，我也复制我自己。我会乐此不疲地使用我在回应家庭时的拿手好戏。我会选择对某些家庭在某些情境下似乎有效的某个词语或者概念，并且在类似的情形下重复使用。我尝试过明暗化(shading)、幽默以及各种情绪化的音调等方法。这些方法最初是自发或者自然出现的，不过，令我惊讶的是，慢慢地就变成了技巧。最终，这些技巧变成了我的拿手好戏的一部分，而我并没意识到我正在使用它们，就像 Samurai 的剑变成了他的手臂的一部分一样。阅读我著作的读者，也许可以津津乐道地追溯我是如何频繁地重复我自己的，好像我总是在自发地创新(spontaneously innovating)。

经过数十年的治疗实践，我已经从一个主动的挑战者——对抗、指导、控制——转向更柔和的风格，其中，我可以运用幽默、接纳、支持、建议、引导等方法，去达到以前需要运用犀利的风格才能达到的目标。我已经从指导者转变成为一个协作者，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专家的角色；从所植根的社会情境去看家庭和人类，转向于观察家庭系统和个人的精神世界，但并没有丧失对其相互影响的警觉；从目不旁视地关注现在，到探索过去的影响，不过，目标依然在于促进现在的改变。这些变化使得我的风格更为复杂，也更加色彩纷呈。

通过这些转变，有些行为和某些词汇，已经变成了我的商标。现在我将与你一起分享这些词汇和行为，希望你能在合适的时候借用。

非言语干预

● 我采用空间作为情绪亲近程度的标志。例如，正如你稍后将看到的一